

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 第一辑 名局

02

陈祖德

血泪篇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 CITIC PRESS

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 • 第一辑 名局 • 02

血泪篇

天

陈祖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·血泪篇 / 陈祖德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1.4
ISBN 978-7-5086-2693-2

I. 中… II. 陈 III. 围棋-古谱 (棋类运动) IV. G891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0288 号

血泪篇

XUELEI PIAN

著 者: 陈祖德

责任编辑: 肖新明

策划编辑: 王 强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 张: 26.5 字 数: 75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2693-2/G·669

定 价: 9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http: //www.publish.citic.com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283

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

我的助手牛力力从中国带回了祖德先生的消息，得知他正在研究和讲解清朝的古棋，这令我十分喜慰。

吴清源

总序

我的助手牛力力从中国带回了祖德先生的消息，得知他正在研究和讲解清朝的古棋，这令我十分喜慰。

回思上世纪五十年代与川端康成先生的对话，我曾比较过中日两国在两三百年以前围棋发展的盛况。那时的日本围棋，在德川幕府的治下，出现了划时代的名人——道策，他的棋力超群，有“十三段”的美誉，更创制了“道策流”，开启了近代布局的先河，可以说是棋界了不起的大人物。

但在清朝康熙、乾隆年间，中国的座子围棋，也达到了巅峰，或者可以更准确地说，中国围棋最强的时代，就是在三百年前左右的乾隆时代。当时的中国，名家辈出，其中更有像黄月天（龙士）、施定庵（襄夏）等超群拔俗的强手。但两国的翘楚，道策先生以及后起的丈和先生，与清朝的黄月天、施定庵、范西屏三位棋圣，并没有在盘上一争短长的机缘；道光、咸丰年间，争夺名人碁所失利的幻庵因硕，曾有意来华，与当时中国的大国手周小松切磋棋艺，然也因海路不通而作罢。但清代大国手的棋力，我以为是到达了非常了不起的程度的，应相当于日本的名人一级的水平。

我是根据从清朝流传下来的棋谱集，而得出这一判断的，五十年前我对川端先生如是

说，时至今日，我仍然抱持这样的信念。

但清朝并没有幕府将军为棋士提供禄米，也没有“名人碁所”、“御城碁”这样严密的制度作为支撑，而只有贵族或富豪不定期主办的棋赛，中国顶尖的名手，于是依赖悬赏的奖金获得收入。

在康熙时期，黄月天独步天下，没有人能和他相抗衡；到了乾隆年间，则是施定庵与范西屏两人并立的时代。“但是不知何故，两雄之间的对弈局数很少，全部不过十二三局而已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富豪所举办的十局赛，这十局棋被称为千两之棋；也就是说，一局就相当于一百两的价值，而当时的一千两，以今天的价值来看，应该相当有一千万元（指上世纪50年代的日元。——编者注）吧？此二人就可以说是相当高强的专家棋士，并且一生就是以围棋为职业而持续地下棋。”

“其中还有名为‘血泪篇’的黄月天与徐星友之对弈谱流传于世。徐星友当时虽然已号称国手等级，但是其棋力还是比不上黄月天，两者当时的局差是先二左右，但是黄月天却说实际上可以让徐星友三子，于是徐星友非常愤慨，真的就和黄月天下了受三子的十局赛。当然，最后这个十局赛是黄月天输多胜少，不过还是有几局棋是黄月天漂亮地获胜，所以被称为‘血泪篇’，是非常精彩的名局。”

但到了清朝的末年，中国的围棋水准急剧地衰退，到达了谷底。我的老师顾水如先生、汪云峰先生，与中国最后一位大国手周小松，可能要以“先二”的棋格才能与之相抗。此后，中国围棋的水准慢慢回升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终于达到今日的光辉兴盛局面。

中国清代的围棋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，既有清末中国围棋急剧衰落，在一般人心目中造成了中国古棋不如日本围棋的深刻印象，又有那时的战法，与现代的围棋大大不同的原因。因为，“即使看了乾隆时代的古谱，也无法应用到现代的下法中，因此不受到重视，也很少被拿来研究”。

但围棋的玄妙、幽深，又非一时一地、一人一局所能勘破。三百年前的下法，在今人看来，已经有了不甚满意的地方；三百年后，后人看我们今天的棋，是否也会抱持同样的看法？我们虽然不得而知，但以事理推断，明矣。

祖德先生发思古之幽情，整理国故，他的着眼点，想来也在此处。此举善莫大焉，于是欣然草文，以为响应。



国际围棋联盟主席

常振明

序

祖德先生的“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”交由中信出版社出版，是文化界、围棋界的一件盛事。

我与祖德先生的交谊已经有几十年了，因为在入读大学以前，我曾经是北京市的一名专业棋手。在棋上，祖德先生是我的前辈，在国家队一起训练或比赛时，我常有机会向他请教。在年龄上，祖德先生长我十二岁，温文尔雅，待我如同兄长一般。我在棋界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这一段浓厚的记忆，常常令我回味。

那时候，我们的国家队基本上还是以日本为师，耳濡目染的是日本棋界所开发出来的下法，如小目的定式，木谷实与吴清源的新布石，运筹布子讲究棋理和棋形，等等，并且在棋手中间，有一种赶超日本的气氛，于是，对我们的前辈，明清时代的国手所遵循的下法，当时并没有余力过多地涉猎。

但是从2005年起，我们的年轻棋手常昊、罗洗河、古力，包括中信北京队的孔杰等，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一系列的佳绩，从顶尖棋手的层面以及整体厚度的层面，可以说，我们不仅超过了日本，与以前的“苦手”韩国相比，也占了一点上风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回过头来研究古代围棋，从我们的古谱中汲取营养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的确是非常好的时机。

唐太宗曾经说：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”历史这面镜子，不仅记载了过去，从中也可以推知未来。像我国的古代围棋，经历了魏晋、唐宋，到明清时达到了顶峰，但从清末至民国，随着国势的衰退，围棋的水平也大大地倒退。只是在新中国，由于陈毅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提倡，围棋才重新步入了兴旺的局面，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终于回到了我们的祖先曾经达到的“盛世景象”。抚今追昔，令人感慨。

围棋的盛衰、兴替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里边起作用？陈毅元帅有一句名言，叫做“国运盛，棋运盛”，说的是外部的环境，国家的繁荣，是围棋事业兴盛的主导条件；另一方面，棋手们是否有开阔的胸襟、前进的动力，乐意于从方方面面汲取养分的谦虚态度，我以为也是重要的内部因素。

围棋是我们的国粹，凝聚了先人们杰出的智慧。对它的继承和发扬，是我们每一个热爱围棋的人都无可推卸的责任。中信集团多年以来一直关注着围棋事业的发展以及围棋文化的传承。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第九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，中信集团曾给予了一定的资助。在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创办之初，中信集团组队“中信大三元”，连续四届参加了比赛。2009年，中信集团再度与北京围棋队联手，更名为“中信北京队”，重返围甲的大舞台。此外，对于围棋团体的成长、青少年棋手的培养，中信集团也曾稍尽绵力。

中信出版社以前曾经推出过吴清源大师的作品，如他的自传《中的精神》，以及他的棋谱选集《人生十八局》等，获得了一些好评。这次与祖德先生携手，把目光转向我们的传统文化——明清时期的古谱，制作一个大系列，以此来传承和发扬国故，也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可。



吴远之

推荐序

中国流，大格局

世事如棋。

国家如此，人生如此，博弈也如此。新中国第一代棋手陈祖德先生一生的命运，和国家的命运，和中国围棋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
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，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，并且在很长时间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。也就是说，中华民族这盘棋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，我们领先了很长时间。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，抑或是明清之盛世，无不闪耀着中华文明的荣光。

但世事有更替，棋局有起落。中国清代康、乾之时，社会繁盛，中国围棋亦名家辈出；而中国近代的一百多年，是中华民族饱经苦难的一百多年，最能体现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中国围棋亦跌落谷底。棋局流转之际，各行各业都会出现一些人物，尤其是在关键的转折时期。对于围棋而言，陈祖德先生是这样一位转折性的人物。从他之后，中国围棋的格局发生了巨大转变。

陈祖德先生为中国现代围棋作出了卓越贡献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首先，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棋手和第一位九段棋手，陈祖德先生毫无疑问是中国近代围棋的优秀传承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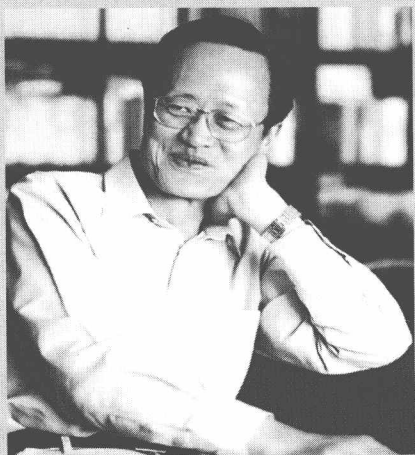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，陈祖德先生是中国现代围棋的开拓者。在中国围棋万马齐喑、处于低谷之时，作为棋手时的陈祖德先生创新出兼顾实地与外势，同时又注重速度的“中国流”，这是他对古今中外围棋技术兼收并蓄基础上的开拓创新，也是他留给世界围棋的宝贵财富。作为中国围棋运动主管领导时的陈祖德先生，创新围棋管理体制，为中国围棋的复兴和今日中国围棋之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。第三，陈祖德先生是中国围棋的勇敢的实践者，在当时近乎单兵作战的情况下，成为第一个打败日本九段棋手的中国人。陈祖德先生的另一伟大举措就是创立中国棋院，第一次将职业联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通过先进的理念和合适的安排，提高到了职业化和艺术化的境界，极大地推动了围棋事业的发展。以目前中国围棋的昌盛局面，如果能继续保持整体优势，中国围棋迟早将迎来独领风骚的时代。如果没有传承，如果没有开拓，如果没有勇敢，就不可能有这种贡献。

我和陈先生是忘年交，虽行业不同，但都同样经历过对生命的终极体悟。茶与棋，虽非孪生，但也都是中华民族祖先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，也同样经历过相似的起承沉浮。对于未来，都有共同的期待。因此，本人对陈先生的传奇人生充满敬佩之情，对于陈先生致力于整理国故的努力，非常认可。作为茶人，我们非常愿意侍立左右，敬奉一杯好茶。

中国这盘好局刚刚开始，中国围棋的好局也方兴未艾。一盘好棋，布局只是开始，中盘角力与结局收官，同等重要。稳守思攻，慎始慎终，执中致和，纹枰的天地虽小，但充分闪耀着中华智慧的光芒。只有对棋理有精到把握而又下棋、读书和做人三位一体的人，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深刻理解而又能恪守本分的人，只有珍视传统而又不断开拓进取的人，只有溯本思源而又放眼未来的人，只有胸怀天下而又脚踏实地的人，只有不断挑战自我而又淡定从容的人，只有经历过起落沉浮乃至生死考验的人，才能有超常之境界与格局，才能对生命的真谛有深刻的把握，才能对自己人生的棋局做出舒展的安排。

中国流，大格局。

是为序。



围棋的历史悠久，远远早于四大发明，而且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智慧。

陈祖德

自序

如果不是中华民族来发明， 世界上至今也不会有围棋

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。人们经常提四大发明，其实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发明创造何止这四项？譬如围棋，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发明。围棋的历史悠久，远远早于四大发明，而且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智慧。四大发明固然了不起，但只是我们比其他民族先走了一步，如果我们不发明，其他民族早晚也会发明。唯有围棋，如果不是中华民族来发明，那么，世界上至今也不会有围棋。

围棋深奥莫测、变化无穷。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前发明围棋，数千年后的我们，怎么想都想不明白，都觉得不可思议：先祖有怎样的聪明怎样的智慧才能发明围棋？难怪有人认为围棋是外星人发明的。

还有不可思议的是，历史无情，只要跟不上历史的发展，不符合时代的节拍，历史必然将它淘汰。数千年的历史长河，不知淘汰了多少东西。多少文化艺术才短短二三百年的历史，如今已无以存矣，或者是需要保护需要抢救矣，偏偏围棋越活越年轻。

围棋历经数千年，非但没被淘汰没成为老朽，相反，如今生机勃勃、热力四射、阳光灿烂。今天的围棋，在国内有长江后浪推前浪般的汹涌的爱好者，特别是少年儿童爱好者；在世界上更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、所喜爱。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艺术却绽放出无比旺盛的生命力，这是最不可思议的。

我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和文人墨客都会下围棋，其中有很多对围棋情有独钟，甚至痴迷。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有关围棋的诗词赋文以及趣闻轶事。历朝历代对社会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群体，可能在交往和游戏间，就肩负起了围棋的薪火传承。

魏晋唐宋时期我国的文化艺术包括围棋蓬勃发展。围棋本身具有文化性和竞技性两个主要方面，而我国古代社会重视的主要在精神层面，好像觉得看重竞技看重胜负似有悖文化艺术的清雅脱俗。苏东坡的名言“胜固欣然，败亦可喜”，是对胜负的一种洒脱，也是当时的一种人生态度。

我国古代围棋水平真正的提高是从明末开始，至清康乾盛世达到了无限风光的顶峰。正如陈毅同志所说“国运盛，棋运盛”。

祖国的千年前的精美棋具， 只在日本奈良的博物馆“正仓院”

康乾时代，棋坛人才辈出，强手如林。令人可喜的是，留下了大量的棋谱和各种围棋著作。但同时我又感到遗憾和痛心，因为这之前留下的围棋史料太少太少。围棋最早的古谱是宋本《忘忧清乐集》，其中有三国时代东吴的孙权与吕范的对局，但这张棋谱的真假无从考证。

围棋在春秋战国时已相当普遍，孔、孟曾多次提及围棋。但春秋战国时的围棋究竟怎么样？孔、孟的围棋又下得如何？想看到竹简时代的棋谱无疑是种奢望。

然而秦代有了篆书，尤其是汉代有了隶书，文字已发展到书法艺术，当时留下围棋的棋谱应当是有可能了。但历代那些酷爱围棋的有名的君王、士大夫以及大诗人、大才子，如汉高祖刘邦、曹操和曹丕父子、梁武帝萧衍、唐太宗李世民、唐玄宗李隆基、宋太祖赵匡胤、宋徽宗赵佶、明太祖朱元璋以及他的大将徐达和大臣刘伯温等等，还有杜甫、杜牧、白居易、王维、刘禹锡、李商隐、韩愈、陆游、文天祥和王安石、黄庭坚、苏东坡等家喻户晓的文坛北斗，他们为围棋留下了丰富的传闻和诗文，可就是未留下一张棋谱！这给人留下无限想象和无穷遗憾！

我们的智慧而潇洒的先人呵！难道是历史太悠久了，反而不懂得历史的价值？难道是文化太丰厚了，反而不珍惜文化的遗存？

不要说棋谱，就是棋具，远的不用说，就说最后一个王朝——清代，围棋如此盛行，可我却从未见过清代的棋盘棋子。

在日本奈良的博物馆“正仓院”中，珍藏着两副唐朝皇帝赠送日本的棋盘棋子。棋盘由上好的紫檀木制作，棋盘的四周边上是精致的图案。对局双方可由棋盘边上拉开一个抽屉，其中各放着一个乌龟造型的棋盒。棋盒中每颗棋子均画有色彩艳丽的飞鸟。这两副棋具，材质优良、构思精妙、工艺极致，可谓美轮美奂，无与伦比。我们的祖先怎么能制作出如此精美的棋具，如此超一流的工艺品？！望着这两副棋具，可以想象围棋在千年之前是什么样的水平。

可是祖国的千年前的精美棋具只能在异国他乡才能见到，而在自己的祖国，不要说千年之前，就是百年历史的一般棋具都难以寻觅！

我国最早的围棋文献《敦煌碁经》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。我多么希望能够在故国故土一睹！但再想想，《敦煌碁经》这部文献毕竟保留下来了。如果它不曾远渡重洋，依然在故乡，那它的命运又会怎样？

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太多太多，但我们失去了多少多少？

围棋有娱乐、教育、交流、健身等功能， 何必都要挤上职业棋手这独木桥

新中国成立后，围棋得到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心，得以很快复兴。我国围棋界以赶超日本为目标，精诚团结，自强不息，水平急速提高。

围棋事业需要拿成绩来证明自己，人民大众需要成绩以得到鼓舞，祖国需要成绩来扬眉吐气。围棋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，竞技性越来越突出。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忽视了围棋竞技性，而在这短短几十年中几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。竞技性当然很重要，但任何事情都有个度，当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竞技和胜负上，自然，文化性被忽视、被冷落、被遗忘，甚至被淡出。

现在我国有很多孩子学围棋，不少孩子的家长为了把自己的宝贝培养成常昊、古力这

样的世界冠军，大人孩子付出多少代价，使快乐的围棋变得那么的沉重。在北京集中了全国各地那些非常聪明优秀的小棋手，很有些孩子甚至宁可学业荒废，或者连小学都不上，只是希望成为职业棋手。这似乎是围棋的盛事，但总令人感到不是滋味，这是围棋事业发展的一个异化现象。

围棋与生俱来地是多功能的。首先是娱乐功能，围棋充满着乐趣，魅力无比，能叫人乐此不疲，忘乎所以，用现在的流行语叫“乐活”。围棋有教育功能，围棋好的孩子数学一定好。围棋的核心是阴阳，充满着辩证法，包含着丰富的哲理。围棋所包含的哲理可运用到方方面面，可提升境界，启迪人生。尤其通过学围棋能使孩子的素质全面提高。围棋有交际功能，围棋有个别名叫“手谈”，下棋即交流，可能得到终生的好友。纹枰手谈心领神会有利于和谐社会。日本的“围棋五得”，头两条，即得好友、得人和。围棋还有健身功能，围棋能使大脑得到很好的锻炼，益智健身，下围棋的人大多长寿，我还未听说过下围棋的人患老年痴呆症。日本“围棋五得”的最后一条，即是得天寿。

古人还创造出无数优美动人的围棋诗词赋文。当代有人收集整理出版了一本《围棋文化诗词选》，其中不少古代围棋诗词佳作，但我深信这只是历史上的一小部分。

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围棋，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无穷乐趣！何必都要挤上职业棋手这独木桥。现在的社会功利性过强，这种功利性有意识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棋手。如研究棋谱只看重韩国一线棋手的对局，日本的棋谱已不屑一顾，更何况我国的古谱。很多棋手根本没看过我国的古谱，恐怕连古代那些大国手的名字也全然不知。

要知道中华民族有多智慧吗， 围棋古谱告诉你

围棋水平的等级分为九段，这源自于日本，而九段的等级无疑来自于我国古代的九品。我国古代围棋的等级和官员一样，也分为九品，一品最高，九品居下。每个等级又有其很雅的名称，一品曰入神，以下分别是坐照、具体、通幽、用智、小巧、斗力、若愚、守拙。多么有意思。

古人给围棋取了很多别名，以形状命名的是方圆、纹枰，以颜色命名的是黑白、乌鹭。在晋代又给了围棋不少雅号，如手谈、坐隐、烂柯、忘忧，围棋太有趣、太吸引人，故又将围棋称为木野狐，等等。

唐宋时代的围棋国手王积薪、刘仲甫写的“围棋十诀”、“棋经十三篇”，享誉海内外，至今常被人引用，说明其含义之深刻，影响之巨大。

清代留下了很多精彩纷呈的棋谱。古代的下法与现在有所不同，主要区别在古代对局双方先在对角放上座子，此外要还棋头，即多一块棋多还一子。这两条决定了与现在下法上的差异。但棋理相通，技艺无异，我们研究古代棋谱，不但可以让我们了解过去，而且可让我们欣赏古代优秀棋手的才华，他们构思的巧妙、计算的精确令人折服。清代的围棋国手众多，每人风格不同，各有所长。最突出的是三位大国手，他们是康熙年代的黄龙士和乾隆年代的施襄夏、范西屏。他们将中华民族的智慧在围棋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达到了古代围棋的巅峰。

有人可能会拿现在的棋理、现在的眼光去审视、评判他们，感到有这样那样的不足，因而取否定态度。但这显然是不公正的，是片面的。不同的时代不能这样比较，正如不能拿吴清源同李昌镐相比较，正如再过数百年，或有人会指责今天的棋手这样那样的不足或不明棋理，因此否定今天的棋手，这又公正吗？

明清的围棋国手众多，又传承了大量的棋谱。虽然有棋谱，但从未有人系统地评注。我曾出过一本《当湖十局细解》，仅此而已。把古代国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、最精彩的对局有系统地评注讲解，以此介绍给当今社会，这项工作工程很大，但又必须有人去做，不做对不起我们的先人，也对不起今人，对不起当前蓬勃发展的围棋大好形势。

前年，我曾在天元围棋频道中讲解了一些古代国手的对局，越讲越感到有必要将这些古谱有系统地整理出版。我终于决心挑起这副重担，这副担子可能要压我多年，但这是我的责任，是我的使命。

吴清源先生得知我要从事这项工作，特意从日本发来长文，表示对我的支持。吴先生是我所景仰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棋士，他以九十六岁的高龄，写下这么多的文字，我既感到愧不敢当，又感到莫大的鼓舞。

这里，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、云南大益茶业集团的董事长吴远之先生，他不但将大益普洱茶办成我国规模最大、效益最好的茶企业，而且他把那最大和最好的决心，投向了慈善事业，投向了文化事业。我目睹了他那云南大益爱心基金会这些年来所做的善事，我觉得大受益和大感动！吴先生知道我要出一套古谱大系，鼎力相助，使我能安心地一步一步走进古谱。

我也要感谢中信出版社。该出版社隶属于中国中信集团，中信集团多年来与围棋有不解之缘，对我国围棋事业作出很多贡献。现在中信集团的董事长常振明先生年轻时是围棋

高手，参加过不少重大比赛，并取得过出色的成绩。他对围棋的理解和热情使我决心并放心地将此书交给中信出版社。中信出版社曾出版过数本吴清源的书籍，很获好评。我相信这次和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。

最后，我要感谢我的两位助手程天祥和黎剑。我虽然已退休，但工作依然繁忙，简直不亚于退休前，因此靠一己之力恐难以胜任，如今有了两位尽心尽力的助手，天助吾也。

弈者小传

查丕栋 程天祥

“血泪篇”版本及其他

黄龙士先生的生平大略，在《黄龙周虎》一书中，已由查丕栋先生的专文详述了，因此这里我们单说徐星友。

徐星友，名远，浙江钱塘（今杭州市）人。大约生于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，卒年不详。关于他的生平的最后记载，是康熙六十年（1721年）指导少年时期的范西屏、施定庵，授三子对局。编辑刊印《海昌二妙集》的蒯光典、黄绍箕在《范西屏施定庵二先生年谱》中记述说：“辛丑，西屏十三岁，定庵十二岁。定庵与西屏争先。遇徐叟星友，受三子。得《兼山堂谱》，潜玩经年。”推算年岁，徐星友当时已年近八十了。

徐星友家境富有，从小向学，知诗书，工文辞，擅于书画。他长于象棋，有《弃马十八法》抄本，传为徐星友所撰。但他岁至壮年，却爱上了围棋，于是从名满天下的黄龙士学弈。徐钻研棋艺十分勤奋，有三年不下楼之说。谚曰：“人过三十不学艺”。徐星友壮年习弈，卓有成就，名重弈坛，实在是个奇迹。

黄龙士中年逝后，徐星友弈名大著，往来于大江南北，足迹半天下。《杭州府志》记云：“黄龙士以弈擅长，远晚出与之齐名。游京师，朱邸多招致之。高丽使者自矜其弈无偶，远与对局，连胜之，由是名益著。”

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年），孔尚任记述道：“周东侯，弈局国手。武林（今杭州）徐星友来京，自谓过之。有贵公悬金币为寿，早食方罢，即命对局。踌躇一子，历时数刻。予窃旁观。日移午矣，周老输二子，袖手而去。”以周、徐此战为标志，徐星友成为海内第一。

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，年事已高的徐星友，受到了青年程兰如的挑战。据赵之云先生《围棋词典》，两人年龄的差距达四十八岁。这本是一场不甚公平的决斗，且据《弈选小

传》、《清代述异》等记载，是时，海内推星友第一，尝弈于某处，主事者忌星友盛名，嗾使众国手阴助兰如，星友屡败，遂南归故里，锐意著书。

十年之后，《兼山堂弈谱》乃得大成。徐精选清初至康熙后期名手过百龄、周懒予、盛大有、李元兆、季心雪、姚吁孺、吴孔祚、汪汉年、周东侯、卞邠原、谢有玉、徐星友、何闇公、黄龙士、黄稼书、娄子恩、梁魏今、吴来仪、张继芳等十九人的六十二局棋谱，十年批阅，逐局加以评注。徐星友熟悉当时棋人棋事，对清初以来棋式、棋风的演进状况亦知之甚详，加上他棋艺精湛，文采风流，所以评语文笔淋漓酣畅；权衡得失，细致入微；不务奇特，平实可学。该书刻成于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年），当时棋家如施定庵等曾研究全谱，颇有所心得。施定庵曰：“徐著《兼山堂谱》，诚弈学大宗。所论正兵，大意皆可法。”主持《弈理指归图》刊行的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曰：“兼山谱一出，而诸谱尽废。”（见《弈理指归图》）

徐星友的让子棋谱被编入《绘声园弈谱》、《师竹斋谱》。《寄青霞馆弈选》刊有徐星友遗谱一百一十余局。

徐星友棋风，正如他在《兼山堂弈谱》中评棋时所说的那样，“冲和恬淡，浑沦融和”，“闲淡整密，大方正派”。以致邓元鏊在《弈评》中说“徐星友如白傅（指白居易）吟诗，老姬皆解。”

“血泪篇”成于清代康熙年间，是当时的大国手黄龙士与后起的徐星友之间的让三子局（具体言之则是康熙八年到三十年，这是黄龙士的主要活动时代），在我国围棋史上非常有名。自古以来，让子棋的分量就逊于对子局，但“血泪篇”是个例外。它所以重于一般的对子局，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：其一，两位对局者都是清初棋坛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先后光映于中国棋坛，因此他们之间的对局便格外受到棋家的重视；其二，是棋局的对抗之激烈、精彩之程度非同一般，如清人李汝珍所言，这十局棋中，双方“各竭心思，新奇突兀乃前古所未有”，因此以“血泪”名之。

如果除却这两条，还有别的成因，那可能就是因黄龙士中年早逝而引起的各种猜想了。比如《国弈》的辑录者鲍鼎，就在序言里说：“我朝国工，如周懒予、汪汉年、周东侯诸人，固已上掩往哲。迨黄龙士一出，其落子布算，如飞剑仙侠，令人莫测端倪。同时国手，咸为所败。因而群焉忌之，诱以声色，瞽（mào，眼睛昏花义，引申为乱、昏乱）乱其精神，遂因之致疾而卒。”谭其文《弈选诸家小传》则直指徐星友：“星友受龙士三子后，足不下楼者三年。由是深忌龙士，因延龙士至家，供奉备至，阴使恣情声色。不数年，龙